

北京小康水平生活质量研讨会

综 述

联合国援助中国高校人口学培训与研究PO4项目关于《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及比较研究》课题组与北京人口学会于1994年12月22日,联合在京召开“北京小康水平生活质量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社科院、全国妇联、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老龄委等科研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郭沧萍会长主持,北京市统计局统计应用研究所所长杜午禄和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冯立天教授作重点发言。

一、小康的涵义

小康的涵义是什么?如何把握小康的内涵是研究小康水平首先遇到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杜午禄认为,小康水平是人们生活水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历史发展进程看,生活水平可划分为贫困、温饱、小康和富裕几个阶段,小康是介于温饱与富裕之间的一个阶段。顾名思义,温饱即是穿暖吃饱,生活水准还停留在满足生存需要的低层次上。在温饱基础上,有余力注重和讲究穿着打扮、注意营养和饮食结构,生活消费中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得到初步的满足,那就算进入小康消费水平了。小康水平还应从综合性的角度去考察,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中,从6个方面去把握小康水平,即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和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因此,小康水平是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衡量的,具有综合性特征。小康的量化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小康的内涵也在相应延伸,在量与质的关系中不断扩大质的份量。可见,小康水平又具有某种相对性特征。这一特征还说明小康是通过横向比较而确定自己的位置的。例如中国预期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按1980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其发展程度充其量只相当于世界中下等水平国家行列。

讨论中有人认为,不要从绝对意义上强调小康内涵的相对性,也不应借口小康标准的“相对性”而否定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一个统一衡量的尺度。

二、关于小康指标体系及其量化标准

杜午禄认为,小康指标体系的设置应符合代表性、可比性和可行性原则。据此可选取三大领域23项指标作为评价小康的指标体系。(一)社会经济发展:(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第三产业比重,(3)基尼系数;(二)居民生活质量:(4)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生产费用),(6)城市居民生活费支出,(7)农村居民生活费支出,(8)恩格尔系数,(9)城市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10)人均每天摄取热量,(11)人均每天摄取蛋白质,(12)城市燃气普及率,(13)人均绿地面积,(14)每万人口医院床位数,(15)每万人口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16)每百人拥有电话数,(17)每周工作日,(18)每万人口中大中专以上人口数,(19)每百人拥有的报纸数,

(20) 预期寿命, (21) 婴儿死亡率; (三) 社会稳定; (22) 职工生活费指数, (23) 社会保障覆盖率。

与会者对上述小康指标体系的设计没有提出很多疑义, 但有学者认为, 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反映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是很有意义的, 但考虑到它的可操作性差, 实际应用比较困难, 可以列入小康的参考指标中。人们最关心的是, 2000年时到底还有多少个家庭或多少人口的收入, 尚未能达到小康标准, 占多大比重? 在这部分家庭和人口中, 还没有脱贫的家庭和人口占多大的比重? 这是最直接的指标。对此, 我们应当规定一个数量界限, 比如贫困人口不超过2%, 温饱人口不超过8%时, 就可算作总体进入小康社会了。采用这样一个指标计量方法, 可以督促各级政府对现有的贫困家庭或贫困人口群体给予加倍的关注。这种计量办法不仅适用于收入分配, 也适用诸如住房、清洁饮用水、卫生厕所等指标中。此外, 有学者指出, 上述指标体系是根据北京的情况来设计的, 如果作为全国的指标体系, 反映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指标, 似应加上成人识字率或文盲半文盲率以及各级学校学龄在校率。同时, 每万人口中, 大中专以上人口数这一指标不如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替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年一度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和人类发展指数, 其中反映教育状况的由两个指标组成: 成人识字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

三、关于北京小康指标量化问题

杜午禄向与会者介绍了他们关于北京小康水平量化标准的建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4 000元(按1993年价格计算); 第三产业比重超过50%; 基尼系数控制在0.35以内; 城市人均生活费收入6 500元(按1994年价格计算); 农村人均纯收入3 500元; 城市人均生活费支出5 500元; 农村人均生活费支出2 500元; 恩格尔系数为0.4; 城市人均住房使用面积15平方米; 人均每天摄取热量2 800大卡; 人均每天摄取蛋白质90克; 城市燃气普及率95%; 人均绿地面积9平米; 每万人口医院病床数70张; 每万人口运行公共交通工具16辆; 每百人拥有电话32部; 每周工作日5天~5天半; 每万人口大中专以上人口数1 700人; 每百人拥有报纸33份; 预期寿命75岁; 婴儿死亡率低于12%; 职工生活费指数1.04; 社会保障覆盖率70%。杜午禄一再说明, 上述量化指标只是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并向市政府提交的建议。

有学者指出, 上述指标体系偏重于城市居民, 而对北京农村有所忽视。建议适当增加衡量北京农村小康的量化指标。此外, 小康水平的居住标准, 不应仅限于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或居住面积, 也要规定拥有必需的住房设施, 建议北京市决策当局, 就农民的小康指标体系及量化标准问题作专题研究与商定。

四、关于北京小康生活质量综合指数问题

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冯立天教授向研讨会递交了书面发言, 就北京小康生活质量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他的看法并进行了综合指数计算。

冯立天首先指出,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高科技和国际交往中心, 以及重要的经济发展基地, 小康生活质量标准应比一般特大城市高一些, 以便匹配于其所处的地位。例如, 就文化教育而言, 一般城市普及9年义务教育制就可以算作达到小康教育标准了, 但北京应提高一个档次, 即要求普及12年义务教育制。其次, 冯认为小康生活质量指标不仅限于规定客观指标, 也应当规定必要的主观感受指标, 即要适当考虑从社会学角度来设计或计量小康生活质量问题。改革开放15年来, 中国社会经济面貌焕然一新, 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之大令人震惊, 然而“端起碗来吃肉, 放下筷子骂娘”不是个别现象。主观生活质量不高, 这里固然有

不能正确对待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和体制改革的问题。毋庸讳言也有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倒逆问题，这就应当引起政府当局的严重关注与警觉，果断采取相应措施，尽最大努力消除隐患，使大多数人吃完肉，放下筷子去“卡拉OK”。

冯立天利用1991年北京城市婚姻家庭生育抽样调查资料，从教育程度、就业满意度、人均家庭收入、居住水平、婚姻生活和健康6个方面进行指数计量，其结果为：教育程度指数64.6，就业指数69.5，人均家庭收入指数54.4，住房指数52.6，婚姻指数85.3，健康指数64.7。北京1991年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综合指数值为65.2。在设计指数时，如值达到75，即跨入小康标准。冯根据其对指数计量的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一）从综合指数构成看，住房指数最低，距小康标准距离相当远，成为制约提高生活质量的瓶颈。被调查者对住房表示不满意的所占比重很大，青年尤甚。例如，北京城市居民对居住条件表示不满意的（含很不满意）占到59.6%，而青年（20~29岁）则竟占到67.8%。这是一个值得警觉的百分比，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其消极影响早已暴露出来，不能等闲视之。可喜的是，北京决策当局已下了大决心，康居工程、危旧房改造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二）收入也是一个薄弱环节，指数只有54.4。改革开放以来劳动人口的收入增长很快，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收入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这是事实。然而，经济收入与生活费用指数迄今尚未能真正挂钩，恩格尔系数长期居高不下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曾规定，恩格尔系数50~59%为温饱型，40~50%为小康型，20~40%为富裕型。杜午禄提出北京达到小康的恩格尔系数为40%左右，冯立天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因为杜把生活费用指数控制在1.04范围内是根本不现实的。杜自己也认为是有难度的。

（三）在追求小康生活质量目标时，不得不采用平均数，但应十分警惕平均数下掩盖着的贫困现象。在设计小康指标体系时，一般都列入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的应用可从收入扩充到其它领域）指标，以便控制不合理地扩大不平等程度。冯立天强调应当明确规定未达到小康标准的家庭或人口所占的最高比重（或贫困家庭和人口所占的最高比重），这要比基尼系数更具可操作性，也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认识。

（四）根据设计，生活质量综合指数达到75时，即迈入小康生活质量标准范围。北京1991年调查数据定量分析表明，离小康标准还有一定距离，约相差10个分值（9.8）。但是，1991年以后北京决策当局在努力提高人口生活质量方面加快了步伐，如果按照这个劲头继续发展下去，2000年总体上实现小康目标将是有把握的。北京市政府积极部署力量，力争提高3年实现小康，这是十分振奋人心的。

有关小康水平和小康生活质量的研究，与实践联系最为紧密。生活质量课题组与北京人口学会将根据实践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适当时候再次召开研讨会，并将学者意见转达给决策部门。

（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人口学会副秘书长 周彦杰整理）

（本文责任编辑 杨子慧）